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档案

国家档案局综合处 编

档案出版社

G271
4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档案

国家档案局综合处 编

档案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责任编辑 胡鸿杰

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档案
国家档案局综合处 编

*

档案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99 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定价: 1.30元
ISBN 7—80019—108—7/G·80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编辑说明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档案工作。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建立和发展我国档案事业，发出了一系列决定、指示、通知等文件。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对档案工作做了许多指示。这些指示，对我们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档案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收入本书的言论，凡公开发表过的，保持原貌；未公开发表过的，在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节录或技术性整理。所有言论(1950—1985)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并做了少量题解。书末所附的五篇材料，供学习本书时参考。

国家档案局综合处

一九八七年

目 录

同档案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五〇年)周恩来 (1)

关于中央会议文件的立卷

(一九五三年)周恩来 (2)

在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杨尚昆 (3)

在原大区档案整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习仲勋 (13)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节录)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 (19)

关于档案工作人员的学习问题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 (20)

要保证档案的完整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习仲勋 (21)

同国家档案局负责同志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 (22)

同档案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六月)陈 毅 (23)

同国家档案局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七月)周恩来 (24)

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周恩来 (25)
我们要重视档案工作, 做好档案工作	
在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	谢觉哉 (26)
努力学习做好档案工作,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	吴玉章 (33)
同国家档案局负责同志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六月)	周恩来 (37)
题赠档案工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	董必武 (38)
题赠档案工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	朱 德 (39)
同档案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	林伯渠 (40)
题赠档案馆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郭沫若 (41)
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乌兰夫 (42)
致曾三同志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贺 龙 (47)
致曾三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	郭沫若 (48)
致国务院工业交通部门负责同志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薄一波 (50)
致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同志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聂荣臻 (51)
接见机要档案系统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 (53)
在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姚依林 (54)
在广东省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节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杨尚昆 (56)
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一九八〇年二月六日)	胡耀邦 (71)
在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方 里 (72)
在全军档案干部训练队结业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杨尚昆 (80)
致邓力群、郁文同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	胡乔木 (85)
在参加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秘书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节录)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胡启立 (86)
关于建立引滦入津工程档案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二月)	万 里 (88)
在全军档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	杨尚昆 (89)
要大力加强档案馆建设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	赵紫阳 (90)
关于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利用档案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	杨尚昆 (91)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为纪念全军建立档案工作三十
周年题词(一九八四年十月) (92)

要搞好档案工作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 习仲勋 (93)

档案管理要现代化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 杨尚昆 (94)

关于加强图书、档案抗酸化研究的一封信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胡乔木 (95)

在全国档案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田纪云 (96)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一九八五年十月七日) 田纪云 (101)

〔附录〕

党领导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档案事业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曾三 张中 (103)

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曾 三 (112)
回忆刘少奇同志对档案工作的几次指示.....曾 三 (126)

在党的爱抚下
——记中央档案馆开馆..... (131)

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
——记中央档案馆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134)

同档案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五〇年)

周 恩 来

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一辈子。

* 这是周恩来同志同政务院档案科工作人员的谈话，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1月7日曾三同志《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一文。

关于中央会议文件的立卷*

(一九五三年)

周 恩 来

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文件，应按照每一次会议进行立卷，以便查找利用。

* 这是周恩来同志关于中央会议文件立卷方法的口头指示。题目为编者所加。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1月7日曾三同志《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一文。

在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

杨尚昆

同志们：

曾三同志要我对档案问题做点宣传工作，我对这个工作也是外行，但是做宣传工作的责任是有的。所以趁这个机会，一方面和同志们见见面，另一方面对档案工作讲几点意见。

档案工作对我们党来说，直到今天还是一项新的工作。过去我们对这件事注意不多。同志们在讨论中也提到这项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传统，就是说我们过去没有建立起这一部分工作。

回想一下，我们党的三十年历史，这件工作是怎样的情况呢？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基本上谈不到什么档案工作。

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还不是一个执政的党，当时是和国民党合作，以后共产党（主要

* 杨尚昆同志这个讲话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根据速记整理的。

是陈独秀)又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党的规模也不大。比如当时上海有个中央,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据我了解那时在秘书处工作的只有十来个人,一架油印机,印一些东西。此外还有一些宣传品,象《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这些都是公开出版的。所以这时对档案工作就注意得很少。

十年内战时期,中央秘书处有一点档案,军队和苏区的机关里也有一点档案。但是经过长征,有些文件就统统烧掉了,因为那时没有办法保存,不烧就叫敌人拿去,就泄露秘密。回想一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时,每个负责同志有一个挑夫,挑着两箱文件,以后就变成两个负责同志一个挑夫;再以后又变成两个负责同志只能有一个小包袱了,背着几份文件;到最后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每个负责同志只剩下一本电报密码以备和中央打电报用。当然那时也背出来两个箱子,其中有井冈山前委的会议记录和毛主席写的一些东西,这是当时党中央唯一的文件,现在保存在中央秘书处,我们称之为“国宝”。所以那时也谈不到有什么档案工作。

到抗日战争时期,情况稍微有点不同,各根据地都积累了一部分档案。这次中央局撤销,华东局印了个《重要文件汇编》,华北局也印了个《重要文件汇编》。但是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政党,保存下来的这点档案就太少了。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有些文件也保存得比较好,但到胡宗南进攻,我们撤退的时候,中央下命令把所有能找到人重新写的文件统统烧掉,剩下的只有十几个箱子用牲口驮出来。中央当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无论如何不叫胡宗南得到我们一份文件;二是无论如何不使胡宗南捉到我们一个干

部。不但文件烧了，连许多干部个人的书籍也都烧了，在整风中读的书、写的笔记和材料，如反对“左”倾、右倾，反对宗派斗争等文件也都烧了。当然烧文件的时候，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只有《两条路线》这本书没有烧，曾三同志把它背出来了。以后还从抗日根据地找回来一些。

过去的情况，简单地说就是这样。

由于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况，现在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党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编写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那就会感到许多东西没有根据可查，只能靠参加过这一斗争的人来回忆。请他们提供一些材料。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把收集资料这个工作再拖上十年，那么有些人就会不存在了，因为这十年中间总会有些人要死去的。所以收集材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各中央局已经收集了一些，中央也计划收集一些，历年来党内中央文件已在开始排印。听说文化机关也把《新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影印出来了，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

总之，在今天以前，我们对档案工作是做得很少的。入城几年来，中央工作很忙，对这个工作也顾不过来，要求省委、地委用很大的力量来做这个工作更有困难，因为他们整天忙着征粮、搞统购统销，这件事在他们脑子里还没有占到一定的位置。因此就发生了以下的情况，过去有那么一大堆文件，解放后接收了一大堆文件，另外某些干部个人还保存了一些文件，这些历史文件，这个机关保存一些，那个机关也保存一些。拿中央机关来讲，就没有一个机关保存的文件是很完整的（当然中央本身的文件还比较完整一些）。过去中

央和军委在一起，以后军委分出去，带走一部分文件，现在又成立了国防部，有些文件又转到了那里，所以现在查某件事情，就可能来文在中央，复文在军委。前几天我还接到新华社一个同志的来信，说新华社还保存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亲笔修改过的一些社论稿子和其它稿子。他们建议中央办公厅统一收集起来保存。这个建议很好。现在保存毛主席手稿的地方，从中央机关来说，至少有十多处，这种情况是不大好的。这些文件可贵的地方并不仅仅因为它是负责同志的手稿，是我们的国宝，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研究某项政策时，可以从稿件里看一看负责同志是怎样修改的，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他注意了哪些问题。所以现在规定要把这些历史性的文件统一集中保管起来。

这种情况给苏联档案专家米留申同志知道以后，曾批评我们，说我们把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历史性文件弄成这个样子，简直是失职。这个批评对不对？应该说是对的。苏联革命胜利后，曾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收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手稿，他们用很高价钱来买这些东西，供学术研究用。并且还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鉴别这些文件的真假，他们对这件工作是很重视的。苏联同志还批评我们的广播电台，连领袖的报告录音都没有，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缺点。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对这些历史文件的处理我想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下决心统统把它烧掉，开个档案工作会议，来专门研究怎样烧法，烧了以后，大家另做别的工作。这样倒很干脆，但是行不行呢？当然不行。现在是嫌文件太

少，而不是嫌文件太多，有好多重要文件都找不到了，如毛主席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手稿，现在就找不到了。再如少奇同志在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关于土地法草案报告十几次的修改稿和最后定稿也不全了，这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所以烧掉这些东西很容易，只要下个决心就行了，但是烧掉文件就烧掉了历史，子子孙孙要骂我们，说岂有此理，连这点遗产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来。同时烧掉对工作上也便利，有些历史文件，中央、毛主席是经常看的，以免中央的决议前后有矛盾，如果烧掉了，只凭脑子记，那么写个决议，就可能和以前的决议发生冲突。现在苏联共产党还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说今天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而且要学习我们党的决议案和兄弟党的决议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的具体发展，在各兄弟党的决议案中有着最好的叙述。但是我们现在就拿出几本决议案来。中央文件是很多的，但是要编一本一九五〇年的政策汇编就编不出来，因为文件不全，这就给我们今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文件不但不能烧，而且不建立起一定的科学制度来管理还不行，进城以前，机要室没有一套制度，要查一个文件就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从头到尾找一遍，听说苏联查一个文件只要五分钟，我们五小时甚至五天也查不到。还有些文件用得多了，翻来翻去搞得简直不象个样子，我们还得想办法修补，当然就更不能说烧掉了。所以说烧的办法行不通。

再一个办法就是不烧，堆在那里让老鼠去啃，这个办法也不行。这个道理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文件越堆越多，必须有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

因此只有采取积极的办法，把这个工作建立起来。当然，这需要逐步去进行，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照着苏联的办法去做，苏联的那一套办法自然很好，但它是我们的将来，若今天就想把全国的档案集中到档案馆，那怎么可能呢？连房子都还没有，修建房子也得几年嘛！即使房子修起来了，但中国的地方这样大，交通又不方便，要完全照苏联那套制度去做也是有困难的，如果硬要搞个档案馆，底下没有档案工作也不行。所以这个工作要搞起来，得慢慢来。

据说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科的学生学了苏联先进经验回去后唱了一点高调，我认为这很好，不要去批评他们，让他们唱去，因为我们现在许多领导同志还不懂得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在他们的脑子里还没有占有一定的位置，他们说苏联档案保存得怎样好、五分钟什么文件都能查出来、房子盖的怎样好等等，这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坏处，只有好处。当然，具体做时，就不能完全照苏联那样，就要从实际出发，毛主席讲过，学习苏联的经验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现在就来搞这个结合。他唱的是高调，那么，我就从实际出发，来一个中调。当然，如果唱的调子太高了，也可以给那些同志讲一下，说苏联的一套经验，也不是一年两年积累起来的。一九二〇年以前不算，就拿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内战结束后那几年来说吧，究竟那个时候苏联的档案工作是个什么样子，恐怕现在的那些苏联专家也没有一个人晓得，因为那时他们才不过十几岁，还在读中学或者读小学。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苏联那个时候的经验，万丈高楼从地起、不能先盖三层楼。当然，也不一定要把时间拉得那样长，人家走了三十几年，我们也得走三十几年，但我们至少

也要走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这些同志在人民大学档案训练班毕业的时候，我们也交待过，你们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回去后要按具体情况办事，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那就是教条主义。要学习苏联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内战时期，还不是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那时就是教条地把苏联的口号搬到中国来，什么武装保卫苏维埃，但自己却是赤手空拳。当时党检讨了这些错误，大家也接受了这个沉痛的教训，现在我们就不要再犯教条主义了。对苏联经验生搬硬套是不行的。所以同志们在学习苏联经验时，一定要结合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比苏联还落后许多年，很多组织还不健全。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建立起来。我们要积极地向中央建议，把这个工作推动一下，比如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档案工作会议，最近国务院又成立了国家档案局，这些情况已经说明这个工作前进了一步。当然，还要修一些房子，把文件放进去，整理一下，有用的东西就把它保存好。大家回去见了党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可以宣传一下，说中央开了这么一个会，这样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过去这些同志并不是不注意这个工作，而是因为这个工作还没有在他们的脑子里占有一定的地位，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要中央下一个指示，全党就会全力以赴。事实上这个工作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注意到了，已经感到这个工作的需要了。同时做好档案工作，保密工作也会得到保障。目前我们的保密情况还不能使人满意，问题还相当严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关来负责接收、保存这些机密文件。因此，无论从编写党的历史，从今天的工作需要，从